

N 本期聚焦

大力开展老年教育

张晓林

发展老年教育是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写进了国家“十三五”规划。在五年规划中阐述和部署老年教育，这是第一次，足以说明老年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足以说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实际上，老年教育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事，也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事业，而是一个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

一、老年教育顺应时代发展应运而生

近几年，老年教育悄然兴起于社会。很多老年大学开学报名的场景十分火爆，入学名额满足不了需要，供不应求，不少地方出现“一座难求”。新华社等一些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做了相应的反映和报道，引起党和政府高层的重视。据统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老年大学创建到现在，全国老年大学已有6万多所，在校学员达600多万人，如果把深入农村乡镇的远程教育的300多万人算在内，老年大学学员有蔚为可观的1000多万人。老年大学已是遍地开花，几乎各省、地市、县都有，只是层级不同，规模不同而已。人们会问，老年教育是怎么来的？缘何在今天兴起？

首先，应该说老年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应运而生，是新时期的必然产物。当代老年人的身上和其他人群一样，鲜明地体现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物质世界的富裕使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过去被贫穷匮乏禁锢、压抑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很多内在的学习欲望和需求释放和焕发出来。这是一个大背景、大前提、大条件。

其次，我国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亿多60岁以上老人，已是名副其实的老龄社会。老龄社会来得快、来得猛，老年人这一白发银族越来越庞大，退休后的老年人如何展开自己的生活，则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选择了学习，用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再次，这一代老年人大都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孩子们长大了，出国学习，外出就业，儿女不在身边既经常又普遍。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的不少，老人的闲暇时间多了，这为老年人走进老年大学，重拾学习，接受老年教育，提供了便利。

二、有一个重新认识老年人的问题

兴起的老年教育，提出了一个重新认识老年人的问题。常言道，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老年人

是任何社会都有的现象，是极为普通又司空见惯的特定群体。老年人天天都会遇到，也经常要和老年人打交道，不少人以为熟悉、熟知老年人。其实不然，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老年教育热的兴起，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和认识当今时代的老年人。

以往提到老年人，大都会想到退休在家，足不出远行，照看儿孙，颐养天年。这样的老年人形象，是根深蒂固的。但现在如果对老年人的看法还停留在上面，恐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是肤浅片面的。老年教育热的兴起，使我们有了新的看法。现在的老年人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视野开阔，兴趣广泛。认为60岁、70岁还不算老，仅仅是处于临“老”状态，还属于人生的“黄金时光”。他们涌向老年大学，选课学习，学书法，学绘画，学音乐，学烹调，学

涉及老年人的再社会化问题，也是老年人走好人生旅程的必修之课。老年人有阅历、有经验，无疑是个优势，但在高科技广泛融入社会生活的今天，老年人的这种优势可能要大打折扣，所剩无几。老年人要和其他人一样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面对互联网和信息化的生活，面对信息技术对周围一切的渗透和改变。数字化、信息化几乎成了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常识，只有学习和具备一定的技术和文化知识，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畅通无阻，商场购物、买票乘车、外出旅游等。

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化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社会不断科技化的今天，老年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实现再社会化，进入生活、融入生活，在生活的海洋里游刃有余。从这点出发，进入老年大学，接受老年教育，则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电脑，学针灸，希望挖掘自身的潜能，做过去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实现埋在心里的愿望。他们借助于老年教育，希望能够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希望继续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而不要被过早地边缘化。

眼下我国老年人活跃于老年教育中的这种形象，和国际上对老年人的判断是一致的。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时代进步了，生活富裕了，健康和医疗条件改善提高了，老年人衰老的年龄推迟了，一些老年人的活力和生机依然如故，他们对生活的欲望和需求不亚于年轻人。国际上一般把60岁—75岁这个年龄段叫做“前老年时期”，到75岁之后才正式进入老年阶段。从这个视角看，在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老年人群中兴起的学习热，形成的老年教育热，是符合现代国际老龄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是和现代世界老年化发展潮流交融互动、相向而行的。

走进老年大学的老年人有成千上万，选课也是千差万别，有为圆年轻时的音乐梦，上学学唱歌乐器的；有为出国旅游，上学学外语的；有为扩大社交，上学结识新朋友的；有为丰富生活，学插花茶艺、烹饪的……总之，动机和目的迥然不同，但凝聚在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十分明显，即不是为了拿专业文凭，也不是为了学点技术手艺到社会上赚钱，更不会是为了就业择业，没有丝毫的外在压力和诱惑，仅仅是为了追求实现自身的内心愿望和兴趣。

老年大学的课程主要是绘画、书法、古典文学、计算机、摄影等，符合老年人特点，是一种自我充实、完善、提高的教育。老年大

学的这种学习教育显然和传统正规的国民教育截然不同，毫无功利可言，全然是为了唤醒挖掘老年人自身的潜能，是自由自在的学习教育，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学习教育。难怪，老年大学常常出现传统正规学校不曾有的独特现象，学员不愿毕业结业，倒是希望留级蹲班，常留于老年大学的班级之中。为了解决学员不愿毕业结业的困惑，不少老年大学把这样的学员组成“研究班”，让他们依托学校，走进社会“大课堂”，融入社会，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释放能量，也彰显老年人的价值。这一做法深受社会欢迎，赢得不少赞许。

五、打通终身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老年教育可以喻为终身教育、继续教育、人生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这说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我国老龄化日趋严峻的情势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在贯彻实施“十三五”规划期间，必须对老年教育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在“十三五”规划中，老年教育是纳入学习型社会建设之中，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来安排的。这一定位准确而精当，说明老年教育不是传统正规的国民教育，但又是社会所必须的继续教育，是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大教育的重要内容来看待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不断出现，迫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用新知识新技能来引领和推动发展。显而易见，我国老年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理所当然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重要方面；发展老年教育，也自然成为打通人生教育的“最后一公里”的有力冲击波，成为实现终身教育、继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国际上流行“第三年龄段教育”的理念，也着重强调老年教育在人的一生中的重要性。这一理念认为，人生可以划分为四个年龄段。第一年龄段，是人开始社会化和接受教育的阶段，即接受学习教育阶段；第二年龄段，是就业、成家、赡养家庭的阶段，即就业阶段；第三年龄段，是60岁离岗退休以后，老年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又拥有自己支配的足够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学习教育，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潜力，是人生充满自由和独立学习教育的阶段；第四年龄段，则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年龄段，即依赖他人护理阶段。国际社会界定的“第三年龄段教育”，是以60岁—75岁的老年人为教育对象，通过学习教育，使老年人圆年轻时期的梦，继续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过上有情趣的晚年生活，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使老年人回归社会、充实人生，赋予新的生命力。

(作者为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

三、老年教育具有“再社会化”的意义

不要小看了老年教育这一继续教育、人生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它不光是兴趣学习、养老服务，其

N 学者观察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诉求和产品诉求

陈圣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工匠精神”，之后，李克强总理在对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作出重要批示时，又强调：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打造更多消费者满意的品牌，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为促进经济“双中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工匠精神其实是一种职业诉求和产品诉求。所谓职业诉求，就是培养从业人员的敬业感和荣誉感，使他们不仅仅将职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且作为一种事业追求，一种工作荣耀，一种生命守望。他们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认真负责，尽职尽责。而这种职业态度是基于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投入。正是在这份执着坚守之中，他们也享受着社会对他们的职业认同，以及工作本身带给他们的乐趣与荣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七级八级技工不但得到社会的尊重，也收获了相应的地位和待遇。从这一意义上，我非常赞赏央视的纪录片《大国工匠》，社会应该为这些精英喝彩。对于精英的定义不能只局限于政治人物、科学人物、文化人物等，理所当然还包括技能岗位上的优秀人物。有一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领导交

谈，他很自豪谈到他们学校的优秀校友代表：包起帆、徐小平、李斌。这些上海的“工匠”，不仅应该成为应用型大学的骄傲，也应该成为上海的骄傲、全社会的骄傲。

所谓产品诉求，就是从产品设计到产品生产，再到产品检验，直至产品面市，乃至包含消费者使用体验，整个产品链都是一种不断追求完善、精美和极致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工匠精神不能仅仅体现在产品的末端，还应该体现在产品的全过程。让产品始终引领时代，引领潮流，引领审美。

工匠精神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标杆性人物、标杆性企业和标杆性企业实际上是工匠精神的外化，也是中国制造所孜孜以求的文明特质。由于中国的工业文明姗姗来迟，因而现今我们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就是要修补中国在早期工业文明时的缺失。在现代工业文明的重塑中，举起工匠精神的旗帜，就是营造社会氛围、累积心理沉淀、提升实业精髓，为工匠精神的崛起夯实基础。现代企业的文化和理念已不再一味追求大而全，而更注重特而精、特而优，这就无形中形成对工匠精神的呼唤。一批注重高品质、高性能而不吝高价的中国消费群体正在形成，他们也会形成对工匠精神的呼唤。提倡工匠精神应该也必将成为我们社会的自我追求。

(作者为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观点集粹

加强党的领导不是揽权

叶帆在《人民日报》刊文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包括“加强”和“改善”两层涵义。加强党的领导，前提是改善党的领导。而一些领导干部一讲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脑子里其实就只有“加强”二字，把“加强”又简单等同于揽权，事无巨细都要管，似乎管得越多、管得越细就越能加强党的领导。

这显然不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初衷。而且，有的领导干部假借加强党的领导，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甚至搞权力寻租。比如，有的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美其名曰是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在破坏司法工作的领导可能就是“加而不强”甚至“外强中干”。

法公正。有的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该让市场说了算的事情非要自己说了算，美其名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这样的“加强”，实际上是在损害党的领导，也是腐败的诱因。

因此，必须明确，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包打天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指出的，“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要真正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没有“改善”作为前提，“加强”就是一厢情愿，结果党的领导可能就是“加而不强”甚至“外强中干”。

街区制改革具有精神层面意义

山东省委党校王格芳教授在《大众日报》刊文认为，城市街区制改革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街区制改革有利于破解某些现有的城市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也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城市土地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城市街区制改革还有利于建设包容性和谐社会。封闭式小区

的居民往往躲进小区自成一统，居民之间常常是面对面不认识，老死不相往来。大型社区尤其是所谓贵族社区的存在，更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无数个排他性空间的存在，也抬高了社会和谐成本，埋下了社会冲突的隐患。因此，街区制还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它有利于通过开放破除人们心中的围墙，促进城市走向开放、包容、和谐。

缺乏“无中生有”的直觉式创新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竹兰在《新华日报》刊文说，中国的创新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引进模仿型创新起步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创新流程中，并没有处在原始型创新的起点，而是在原始型创新的末端。

全球原始型创新的流程是：直觉式创新—解释式创新—推理式创新—扩散式创新。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是在扩散式创新阶段进入全球创新流程，随后进入了推理式创新的集成创新阶段。中国从原始型创新的末端进入，反向逼近原始型创新前沿，

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有一定保护作用

贺雪峰

在农村调查，与老年人聊天，一些老年人对国家表现出无比的感激。原因是，现在种田不交税了，日子过得好，而且国家推进新农村、新农保，看病能报销，年满60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还能领取70元基础养老金，这真是比儿子给的养老费还多。

区区70元基础养老金，竟然让农村老年人觉得国家政策所提供的保障比养个儿子还好，这与很多人认为国家给农民保障太少，网络上一些人散发不满情绪，可谓泾渭分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反差？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让

农村老年人无比感激，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老年人从来没有获得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而是靠家庭养老。子女不孝，老年人就会无助。他们过去没有既得利益，没有形成利益刚性，现在国家每月发钱，就是天上掉馅饼，当然会真诚感激。当前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意思是养老保障不再分城乡，而是城乡一样。而实际上，城乡可能还真的有些差异。在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同时，农村老年人仍然可以种地，而不需要子女赡养。就算到了不能种地的年龄，还可以种菜，养猪养鸡，从事力所能及的副业。城市老年人没有可以劳动以自给自足的土地，每月几十元养老金，根本无法生存。

换句话说，正是农村的存在，

正是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若失业农民工无乡可返，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失业保险，若国家不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人群失业保险，这些人就无法生存，就会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显然，可以容纳无法进城农民且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制度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弹性，可以应对各种危机冲击。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对农民的保护性结构，这样的结构使中国社会结构保持了弹性，使国家有能力相对自主地分配经济增长剩余，从而使中国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